



环境政治学译丛

Translation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 生态社会主义 还是 生态资本主义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印] 萨拉·萨卡 著  
张淑兰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 环境政治学译丛 ·

# 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印] 萨拉·萨卡 著

张淑兰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印)萨卡著;张淑兰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607-3532-0

- I. 生...
- II. ①萨... ②张...
- III. 生态环境-政治学
- IV. D0-05 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043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5 印张 285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umanity's fundamental choices**

Copyright 1999 Saral Sarkar

Published by an arrangement with Saral Sarkar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2008 Shan-  
do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作者简介

萨拉·萨卡(Saral Sarkar)1936年出生于印度的西孟加拉,自1982年起移居联邦德国的科隆市。此后,他积极参与了德国的生态环境运动与绿党政治,并在随后发表了大量关于绿色与选择性政治的著述,其中包括《西德的绿色选择政治》(1993/1994),从而逐渐成为当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 内容提要

本书从激进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作者始于讨论为什么前苏联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未能解决这一难题,随后则致力于阐明建立在现行工业生产方式和大众消费主义模式上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将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而局部改良后的“生态资本主义”也难以提供对环境破坏和社会非正义两大难题的解决方案。因而,他寄希望于一个基于对进步观念有着完全不同理解的人类未来:一种真正可持续的“好社会”(绿色社会)的观念将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传统——正义与大众参与——密切相关,尽管它在现实中的实现将会采取多样化的社会形式。



## 总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



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诸多形成中的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作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





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的交流与分享。这其中一个基础性的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在该译丛第一辑顺利出版的基础上,笔者在本辑中选择了《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默里·布克金著)、《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拉·萨卡著)、《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塔基斯·福托鲍洛斯著)和《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约翰·德赖泽克著)。这些著



作之所以被选,一方面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为当代环境政治著述中的经典性著作或“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集中展现了“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流派的最新概貌。

当然,“环境政治学译丛”在第一辑出版仅仅两年多后得以继续,首先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05~2008)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它们为这一辑的译丛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助。其次,在本译丛的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和约翰·德赖泽克(John Dryzek)等提供的各方面热情帮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为各自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了专门的前言,而且萨拉·萨卡先生还对自己的著作做了一些文献资料性的补充与完善。最后,我的同事张淑兰博士、李宏博士和博士研究生蔺雪春与郭晨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承担了本辑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再次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对《环境政治学译丛》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所付出的艰巨努力,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邰庆治

2007年8月于山东大学



## 译者说明

在当前的环境政治研究领域,尤其是环境政治的话语中,能够直接与发达国家的学者进行对话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当属印度的学者。他们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思考环境与发展问题,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环境政治理论和话语。当然,他们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的语言优势,因为甘地主义对全球环境政治的影响非比寻常,也因为印度特色的民主给他们的学术带来的自由开放与发达。所以,这本印度学者的著作被慧眼匠心的郁庆治教授纳入其主编的“环境政治学译丛”。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近代以来东西方关注和探讨的最大话题。印度之父们为独立的印度规定的立国原则是“中间道路”,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社会主义,而是吸收二者的精华,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综合加超越”。萨拉·萨卡先生在印度独立时正处于学龄阶段,我想,国父们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因为他既批判了古典社会主义,也批判了生态资本主义,在综合二者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新的发展蓝图——“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他称之为“21 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

为论证其“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作者不仅在第二、三章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为例,而且在第四章引用了大量的事实和



数据,来论证“生态化选择”的无可避免,以及社会主义进行生态发展的潜在可能性。随后在第五、六、七章,作者在批判目前流行的生态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既进一步论证了“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也设计了“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包括新经济、“新人”、新的道德价值观和新文化。然而,诚如作者所言,他只是在理论方面尝试了综合,实际的具体的综合则是活动家的任务。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科学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尚需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关于这一历史重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学者,责无旁贷,世界也在瞩目以待。可喜可贺的是,郇庆治教授等著名学者的环境政治研究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而努力耕耘。

对于一名从事印度研究的后辈而言,能够有机会翻译一位印度学者探讨环境政治的专著,并因而进入印度研究的一个新的前沿领域,我都要十分感谢郇庆治教授给予我的极大信任、鼓励和帮助。他的严谨治学和作为知名学者的责任感,都让我深深感叹,并受益颇多。在他主持下的几次论著翻译工作,不仅仅提高了我的专业英语水平,拓宽了我的专业知识,而且研磨了我的翻译技巧。而这本专著的翻译,更使我有机会细细咀嚼与品味印度学者的思维,加深了我对印度的感悟与了解。我非常渴望能够不辜负郇庆治教授和萨拉·萨卡先生的信任与厚望,但由于本人的能力和水平的限制,这本译著肯定会有很多留待以后修改和完善之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去年金秋十月,我离开我的家人特别是年幼的儿子,带着这本书的翻译任务远涉重洋,现在,译稿即将付梓,我的英伦访学也行将结束,这部译著可以说是我弥足珍贵的新生儿,具有特殊的价值和纪念意义。



最后,我要感谢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 2006 级研究生李昕蕾,她对我翻译的初稿给予了认真而细致的校对,并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然而,对于终稿中所有可能的翻译错误和不当之处,皆由译者负责。

张淑兰

2007 年 8 月于英国牛津大学



## 中译本前言

2006年9月得知山东大学的郇庆治教授计划将本书纳入其主持的“环境政治学译丛”系列翻译出版时,我喜出望外。我一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我的祖国印度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它们独立自主的发展历程——印度在1947年,而中国在1949年。那时,我还是一个学龄儿童。尽管如此,我已开始通过阅读报纸报道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并从中得到启迪。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逐渐意识到了那最令国际评论家关心的问题,即中国和印度能否更快地发展——中国坚持其社会主义经济,而印度实行其混合经济。

但如今,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有趣。因为,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20年中都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而且两大经济体依然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两个国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尽管并非所有的公民同等程度地受益。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已变得极其富有,甚至在像英国的中产阶级一样享受着所有的耐用消费品。因而,如今真正重要的问题已经改变为: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否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维持这种发展。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刚刚成立的苏联也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但是,正如后来所表明的,这一成就的取得



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与道德代价。在本书中,我详细描述并讨论了这些代价。直到1972年即罗马俱乐部发表其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之前,苏联领导人对于与经济 and 生态之间矛盾相关的基本议题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正确理解,尽管那时这些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如今,我们已经对这一矛盾有着远为充分的了解。但是,来自中国媒体和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仍在为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巨大的生态与道德代价。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满足我在本书中所阐明的、解决可能出现的生态与资源危机并创建一个可持续社会的两个前提条件。尽管它在过去25年左右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仍明确坚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而且依然拥有重新恢复到一种计划经济的能力,因为在那里是政治控制经济而不是相反。但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必须进行重新设计。它们不应当像在苏联时期和1978年以前的中国那样。

令我高兴的是,我刚刚读到了一些关于中国努力保护环境的报道。我希望,依然处于雏形阶段的生态运动活动分子能够取得迅速的成长。但是,他们必须与社会主义者合作。这两个政治流派必须达成一种立场综合,这也是大势所趋。否则的话,它们将都没有前途。在本书中,我已经阐明了这样一种综合。如果它能够对这一进程有所贡献的话,我将十分高兴。

本书的英文版完成于1997年。对于一本具有迫切的现实相关性的著作来说,尤其对于一本试图影响人们关于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的思维的著作来说,十年前的数据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在2001年出版的德语版中,我已经对本书涉及的某些重要事实与数字做了更新,并澄清了某些由评论者和读者指出的观点。这对于构成我整个论证基石的第四章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一中文版中,我进一步修改和更新了部分相关内容。但是,我的基本观点并无任何改变。事实上,新的数据更加强化的了我的信念与立场。



我愿意借此机会真诚地感谢郇庆治教授、孔令栋教授，本书译者张淑兰博士和编辑尹凤桐女士，他(她)们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我希望，他(她)们的工作愉快而卓有成效。最后，我期待着与他(她)们的会面并愿意为了共同的事业而继续合作。

萨拉·萨卡

2007年7月10日于联邦德国科隆





## 作者志谢

在知识层面上,我要感谢很多思想家、学者和研究者,正是在他们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我才形成自己的思想。为了论证我个人的观点,我也大量地引用了他们的著作。这些学者和研究者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无法在此一一提及,而且也没有必要。读者将在本书及其参考书目中发现他们的名字。

格瑞特·辉泽(Gerrit Huizer)、皮特·杨森(Pieter Jansan)、沃特·范埃克(Wouter van Eck)、鲍勃·塔塔(Bob Tata)、大卫·欧顿(David Orton)、拉尔夫·史密斯(Ralph Smith)(本书的版权编辑)、罗伯特·摩尔丹诺(Robert Molteno)和出版社的两位秘密评阅人,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在此,我真诚地感谢他们为此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我还要真诚地感谢下面这些人给予我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包括赫尔米尼·卡拉斯(Hermine Karas)、弗雷兹·卡拉斯(Fritz Karas)、罗莎琳德·塔塔姆(Rosalind Tatam)、高文·柯尔卡(Govind Kelkar),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玛丽娅·米斯(Maria Mies)。